

第一章 当兵前后

旧社会有这样一句话：“好铁不打钉，好男不当兵。”不是走投无路，谁也不肯去当兵。

奔上海走
投无路

方靖正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亡命当兵的。一九〇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，方靖出生于江苏江都县仙女庙镇一个木工家庭。弟兄四人，他排行最末。不幸早年父母双亡，全靠大哥大嫂把他抚养成人。

方老人在仙女庙开了一家小小的嫁妆店，颇有收入，所以尚能维持老四上学，一直念到旧制中学三年级。老二是木匠，手艺很不错，但是为人过于忠厚。抗战初期日寇占领他家乡时，有一天鬼子逼他带路下乡清剿，可怜老二出门三里便不识东南西北，鬼子怀疑他有意抗拒，竟用刺刀将他戳死在路旁。老三在幼年即病故。

说起方老人开嫁妆店，也是一个机遇。南通有个清末状元名叫张謇，在家乡兴办实业。方老人常去门下走动帮闲，甚得张謇赏识，张状元便将盖工厂剩下的一些木料送给他。他以这

些木料为资本，在家乡开了另嫁妆店，生意十分兴隆，一度曾是仙女庙受乡亲尊敬的大老板。他交游甚广，先是吃喝嫖赌，随后竟抽上了大烟，最终弄得嫁妆店倒闭尚还不清债务，只得只身去上海谋生。这时方靖已十六岁，骤然生活无着，便去一家酱园当学徒。

酱园当学徒是要终年与坛坛罐罐打交道的，方靖身小力弱，干不了这样重活，经常遭到老板打骂。他干了一年，忍无可忍，不得已去上海寻兄另谋出路。

人言上海十里洋场，遍地是金。方靖见家乡一些亲友从上海回来，都趾高气扬，十分阔绰，便以为大哥在上海也发了财。岂知方老大淘金乏术，一贫如洗！方靖去上海找到大哥时，只见大哥在老西门邮局门前摆一拆字摊，兼代人写家书谋生！梦想骤然幻灭，唯有嚎啕大哭而已。

方老大见了四弟的狼狈相，不禁潜然泪下。又见他饥肠辘辘，只好向旁边的摊贩借数枚铜板，买了一碗阳春面给他充饥。

晚上，兄弟二人走进小南门一条小弄堂里。在一幢陈旧房子的三楼上，有一间不足八平方米的阁楼，其中安放了三张床铺，有一张便是方老大租的。就连这张床的使用权，方老大也只有一半，因为他是与一个长期上夜班的印刷工人合租的。亭子间已无插足余地，兄弟二人只好挤在一张单人床上。

这天晚上，他兄弟二人为谋求今后的生计，苦恼得通宵未眠。显然大哥的拆字摊养不活两张嘴。偌大的上海，竟没有老四糊口的地方！拉洋车是条出路，但老四却无此体力。后来，

还是同室的穷朋友出了个主意：做走街串巷的小贩。但这需要本钱。于是兄弟二人从次日起四处奔走，向亲友求告、借贷。

当时，方家在上海不乏亲友，有的甚至颇为得发。但是在那只看金钱不看人的社会里，又有谁肯无故帮穷人的忙呢？经过三天奔走哀求，所得无几。方老大对老四说：“只有这点本钱，你都拿去，到租界买点洋袜之类的小商品，背着走街串巷吧！这种生意是很辛苦的，你要不辞劳苦，努力去叫卖。赚了钱不可挥霍，要存起来，将来好开店。到那时，我兄弟俩就有出头之日了。眼下，你独自去闯，不要管我，等将来你得发了，再来找我去帮你的忙吧。”

大哥语重心长，四弟喏喏连声，大哥将一切希望寄托于四弟，四弟也决心豁出命去好好干一场。老四不仅走街串巷吆喝，而且有时还去客轮及火车上叫卖，可以说是竭尽了全力。他相信“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”。自己总会有出头之日的。

然而往往事与愿违。光怪陆离的十里洋场，几乎把这个后来的风云人物吞噬。

有一次，方靖背货上客轮去卖，辛辛苦苦赚的几个钱被小偷扒走。当他呼天抢地痛嚎之时，他的货包又被另一窃贼拿走了！

不仅今后生计无着，就连告贷来的本钱也无法偿还。面对黄浦一江春水，他真想闭眼跳下，了此一生；幸好有两个小贩朋友相助，并约他同去投军。他当时把“当兵”与“死”的概念联在一起，决心铤而走险。

当上兵绝
处逾生

无颜再见大哥，他写了一封绝命书托人捎去。信中说：“弟此去九死一生，倘若祖上积德，能稍有起色，必报大哥养育之恩！”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许诺，当兵以后，只要手里有节余，都寄给大哥。他当团长时，化四千大洋在上海南市区海潮路买了一处旧房；晋升旅长后，又化了一万二千元翻造两幢楼房，其中一幢为厂房，资助大哥开办南洋印刷厂。

后来方靖得意时，常与人谈起这段辛酸往事，却很自豪地说：“我想韩信当初如不乞食漂母，受辱胯下，必无登台拜帅之日。我方靖若不在上海被窃贼所乘，也许就此碌碌一生。”

一九二〇年春，方靖由上海去广州，又转到湖南郴州，投入广西武卫军，在总司令马济的司令部充当宪兵。他这时名叫方抑溪，年仅二十岁。

宪兵的待遇比一般部队士兵的待遇要好得多，而且无须操打仗。但这与方靖“不是轰轰烈烈，便是马革裹尸”的志向相违背。他不图安逸，明白只有带兵打仗才能升官。宪兵经常出动，逮捕革命党人，经判决后又要当刽子手。按武卫军的规定：刽子手每枪毙一名犯人可得赏洋三块钱；将犯人砍头示众的可得赏洋五块钱。别人争着干，他却厌恶这一差事；而且参加捕捉革命党人，与这些人接触，逐渐受了影响，以至同情革命。他听说广州在闹革命，便借口回家探亲，返回广州，投入粤军第一路军第一统领（团长）王懋功部，改名为方超。

当时，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奉孙中山先生之命，率军由福建回师广州，驱逐莫荣新、陆荣廷的桂系军阀势力，欢迎孙中山

先生回广州组织大元帅府。这样，粤军也算参加了革命。

方靖后来对人说：“我自从投入粤军，便时来运转了！”诚然，人的一生得失，往往存在时机问题。得一时期或失一时期，将影响今后所走的道路。但方靖后来的飞黄腾达，却与时运无关，而是当时的客观条件所促成的。

粤军虽然说是参加了革命，但其部队的本质，因为尚属军阀势力所控制，没有什么改变。各级军官的作风都很坏，士兵也无纪律可言。从上到下愚昧无知，也没有什么信仰。

当时的局面是各自为政，部队的给养靠占地收税。广州多烟馆、赌摊（谓之赌番摊，聚赌兼售大烟），这是粤军的主要税收来源。所以从军官到士兵，赌钱、抽大烟成风，毫无朝气。

时来
运转

方靖在粤军中发迹，是由于这样的机会：一日，方靖在营门口站岗，忽见连里（当时叫“队”）的司务长，急得满头大汗，进进出出，如同热锅上的蚂蚁。方靖便问他所为何事？他回答说：一个会写字的“蓬（班）长”，平时帮他写算伙食账，因病离队，无人替他写算了，所以很着急。原来这位司务长不识字，方靖便说：“我会写会算，我来帮你吧！”司务长大喜过望：“太好了，你帮我写算，我每月贴你三块大洋”。当时士兵一月薪饷只不过三块大洋，所以这位司务长算是很慷慨的了。然而方靖不为小利所动：“我不要钱，只要求以后不站岗放哨就行了。”司务长慨然允诺：“这好办，你识文断字就不该当兵。我去对队长说知，提升你当蓬长。”

方靖并非怕吃苦，不愿站岗放哨，而是因为粤军的士兵把站岗放哨当儿戏。即使在营门口站岗，也随随便便，把枪靠在

墙上，自己往旁边一坐，抽烟、聊天、打盹都无人过问。军官见了也不责备，因此成了一种毫无意义的形式。

“方靖进过洋学堂”这一消息在全团传开，成了新闻。统领（团长）和管带（营长）找他去谈话，都把他称为“军队里的秀才老爷”。原来在军阀的军队里，中下级军官能识几个字的都很少见，从此，营、团长有些文牍之事交他去办，士兵们也纷纷求他写家信，一时方靖成了全团最受尊敬的人。不到三个月就连升三级：上士班长，准尉司务长，少尉排长。

方靖起初还以为士兵缺乏教育，所以不免粗野随便。后来因为办理文牍，也常与中、下级军官接触，才知道这些军官也和士兵一样粗鲁，军官之间凭义气共事，官兵之间也凭义气联系，互相间都很随便，没有什么明确的界限。说笑打闹，司空见惯，闹急了互相叫骂，乃至挥以老拳，也是常有的事。相打时，一般都以劝解了事，受到严肃处理的不多见。

有一次，统领王懋功穿了一件新长衫走进营房，适逢一管带迎面走来，王叫住他转着身子问：“你看我这长衫不长吧？”管带忙答说：“唔，不长，不长。”王又问：“你看我这长衫不短吧？”管带又点头说：“唔，是的，是的，不短，不短。”王又问：“你看我这长衫不肥吧？”管带又点头：“是的，不肥，不肥。”王忽然大怒：“我要问你瘦不瘦，你一定回答不瘦。我说什么，你答什么，谁要你拍马屁！”旁人都说“骂得好！”管带吃不住劲，便与王统领对骂起来。但是吵过之后，谁也不记仇，当天晚上统领就拿着管带去吃花酒胡闹，和好如初。

这也有个好处，那就是官兵关系比较融洽，开小差的很少

见。有的士兵跑了，过一阵子又回来了，彼此都无怨言。

方靖虽然出身贫苦，但是在这样的军队里，也染上了一些不良嗜好，如抽香烟、赌钱、喝酒等，只不过在上海他体会到“一钱逼死英雄汉”，所以在用钱方面有所节制。

第一次 打仗

一九二一年粤军攻广西，方靖第一次参加打仗，这时他任中尉排长。第一次打仗，难免紧张，他却并不害怕，甚至认为是自己盼望已久的事终于来到了。因此打起仗来，常将生死置之度外，敢拼敢冲，每有攻坚任务，他都抢着应承。攻坚，伤亡是不可避免的，他冒着枪林弹雨毫无惧色。他身边的人纷纷倒下了，他也并不因此而有所犹豫。他第一次完成攻坚任务后，一排人死伤过半。打完仗，他就带着担架队去抬伤员，只见一些受伤的士兵躺在地上痛苦万分地不住呻吟。伤员们见他去了，有的喊叫：“排长啊！做做好事吧，再补我一枪吧？”当看到伤员经不住伤痛要求快点死时，他却怒吼起来：“孬种，子弹穿个窟窿算得了什么！男子汉大丈夫，学娘们哼哼唧唧的，真是白活了！养好伤再打嘛！”方靖的骁勇与其外型毫不相称，所以使人都感到意外，说他打仗时象个疯子。而他却说：“决不为保住这百斤臭皮囊而碌碌终生！”

一九二二年六月，方靖随军北伐，进驻江西吉安、泰和一带。由于沿途作战，他的骁勇一再受人夸奖，也引起了王懋功的重视，提升他为上尉卫队连连长。此时，王懋功已升任旅长。卫队是直接保护旅长的，所以卫队连长是个受人羡慕的差事，方靖却不大愿意，因为卫队很少机会参加作战。他愿意带着军

队常去打仗，打起仗来，要么战死，要么一仗下来便升官。无打仗机会，升官就难一些。

粤军总司令陈炯明拥护孙中山先生本是投机，借以保住其封建割据。现在要他把军队拉出去打仗，当然不愿意，所以勾结北洋军阀，背叛了革命。于是孙中山先生命令粤军许崇智部回师广州讨伐陈炯明。许军抵南雄、始兴，在进攻韶关时受挫，便转而进攻福州。转战三个月，军队粮饷无着，将士叫苦连天。

粤军的待遇本来很不错，士兵的伙食费每天两角钱（银元），一个月合六元，用不了这么多，每月结算，还有两三元的结余。加上三元的军饷，没有染上不良嗜好的，都有钱寄回家。但是这种待遇并无保证，驻防在一个地方可以收税，打了胜仗自然无问题，一打败仗，就粮饷两误了。许崇智部转战三个月，粮饷接济不上，士兵的伙食费降为每天六个铜板，甚至有时断炊，于是士兵们叫骂：“我们原先每天吃两角钱，现在只六个铜板，这仗不能再打下去了！”逃兵一天比一天增多。

七兵行军都有一条干粮袋（布做的长条袋，内装大米，成一圆圈，与子弹袋交叉斜挂在胸前），军官没有这个东西，到了断炊之时，军官首先挨饿，只好向士兵买米。起先一角银毫子可以换到一把米，后来士兵也要断炊了，干粮涨价，用一把银毫子也换不到一把米。

攻打福州 攻打福州的时候，许军原本七气不旺，攻不下来。但是由于福州都督李厚基手下的旅长曹万顺主动率部投诚，内外夹攻，李厚基部遂不战自溃。然而城内尚有李厚基的残部在作垂死挣扎。王懋功唤米方靖，说：

“胜利在望，攻进城去，论功行赏，看谁先占领都督府。都督府里一定有李厚基丢下的财物，仓库内一定有武器弹药。我命令你率卫队连冲进去，赶在别的军队之前占领都督府和仓库。能活捉李厚基更好！你打仗一向勇敢，这个艰巨任务就交给你了！我另派一连人随你进攻，成功之后，必不忘你。”

方靖慨然领命。

巷战往往比攻坚战更危险，因为敌人是在暗处放冷枪。方靖明知危险性极大，却因王懋功待他不薄，仍然奋勇冲入。

攻进都督府后，方靖看到各个房间一片凌乱，桌椅板凳翻倒在地，公文纸片犹如雪花飘得到处都有，便命令士兵们赶快整理，好迎接旅长住进来。整理时，他从地上拣起一些纸片细看，希望从中发现敌人的军事秘密，却没有找到。后来发现一种象当票的单据，上面的字体很怪，难以辨认。他没有时间细看，便命令士兵将这些单据和乱纸扫成一堆，点火焚烧。已经烧了一半，旅军需官跑来，从乱纸堆里拿了单据一看，便跺脚狂呼：“啊呀，老天爷，赶快扑灭！赶快扑灭！”连说带抢地在火堆里乱抓。方靖不明究竟，也跟着从火堆里抢纸片。

火灭之后，旅军需官才指着那好象当票的单据对方靖说：“这纸片就是钱呀！是福建钱庄通行的汇票，拿到钱庄可以兑换银元的呀！”方靖这才后悔不已。两人把抢出来的汇票数了数，只剩下几百元了。在场的人各分一份，所得无几。眼看满可以拿到手的横财，却付之一炬，大家叹息不已。

但是仍然有发了横财的。

有个连长占领了军械库，经王懋功同意，将里面的一部分

军械出售，每支步枪只卖拾把块钱。这个连长因此发了一笔大财。事后，他托方靖写信回家，一次向家中汇去几千元的巨款。

许崇智攻占福州后，孙中山任命他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，令他率部回师广东再度讨伐陈炯明。

许崇智在福州将东路军扩编成十三个旅，士兵大多是江浙一带以去香港当华工为名招募而来的。这些人到了福州才知上当。这时王懋功升任一、三、五、八旅总指挥，提升方靖为少校机枪营营长。在他所接受的新兵中，还有留辮子的青年。

当时蒋介石在许崇智手下任参谋长，他反对回师讨陈，认为陈炯明可以说服利用，应该继续北伐。许崇智坚决执行孙中山先生的命令，率全师经潮汕抵东江、惠州附近，向陈炯明叛军进攻。

许崇智的军队这时虽有十三个旅，实际上缺乏训练，战斗力极差，而且兵源复杂，有很大一部分是由李厚基的残部改编，所以军心不稳。以方靖这一营来讲，从福州开往潮汕中途，夜间竟有一连人开小差！这在军队里是罕见的过失。但是王懋功念方靖平时努力工作，打仗勇敢，只记过了事。

投入粵
军第七旅

方靖所在的第一旅，几乎是上阵即垮，因此全旅被遣散，王懋功也下了野。方靖领到遣散费（三个月薪饷，少校每月薪饷为大洋一百三十五元）后，转入第七旅十四团，少校军衔被保留，却降职为机关枪连连长。因为是领了遣散费又入军队的，必须换一个名字，所以改方超为方靖，字海濂。

一九二四年十月十日，广州发生商团叛乱。所谓商团，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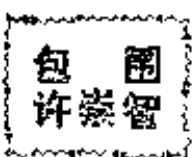
广州一些反动商人组织的武装民团，他们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指使下，公然携枪耀武街头，屠杀工人、市民，胁迫商人罢市，和陈炯明勾结，企图推翻孙中山的革命政府，建立“商人政府”。孙中山先生下令以黄埔军校学生军为主去平定叛乱。方靖所在部队也参加了这次行动。他率机枪连登上高层建筑，准备向商团开火；商团亦不示弱，在街上设置障碍，准备顽抗。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支持，工农群众的积极协助，广东革命政府在十五日平定了商团的叛乱。

一九二五年二月，粤军协同黄埔教导团进行第一次东征，讨伐盘踞广东东江地区的军阀陈炯明。讨伐军经淡水、海丰、陆丰攻入潮州。

那时革命军开始效法苏联红军的编制，连以上设有党代表，多以共产党员任职。党代表的权力在部队首长之上，一切命令无党代表签署，不能执行。有了党代表以后，部队才开展了政治思想工作，由军阀军队改编过来的官兵逐渐懂得了“革命”两个字的意义。于是人们有了信仰，作战有了目标——为革命而战，为革命而死。

这年五月，第七旅改编为粤军第四师，师长许济，下属第七旅旅长谭曙卿，第八旅旅长陆荣廷。原十四团改为第八旅十六团，团长戴武章。

方靖作战勇敢，立下战功，本应晋升营长，但是师长派了个亲戚来，旅长只好让方靖升任副营长兼第二连连长。在粤军中兼职可以领两份薪饷，这算是对方靖没有当到营长的一种补偿。



这年九月，蒋介石以廖仲凯被刺为由，派黄埔学生军包围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在广州东山的公馆。当天下午，机枪营长从团部回营时，交给方靖一捆红袖章，嘱咐他率第二连于夜间行动，任务是封锁许崇智公馆的大门。

方靖与许崇智毫无瓜葛，但他是个很念旧的人，在粤军中混了四、五年之久，许崇智一直是他最崇敬的最高司令官。现在不知身犯何罪，竟然要对司令加以刀兵，他觉得于心不忍。但是“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”，他又不得不去执行命令。于是他派人去许公馆，悄悄唤出许的卫队营长，告诫他说：“现在黄埔学生军已包围公馆，我也奉命用机枪封锁出路，看来大势已去！今晚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，以免我们被迫开火，流弹伤着总司令。”卫队长看到形势不利，只得答应按兵不动。

这天晚上形成包围圈后，许崇智才发觉，便打电话质问蒋介石。蒋不接电话，只让参谋敷衍。许崇智意识到已难逃下野的命运，也不再向蒋介石乞求，便吩咐敞开大门，他在客厅里对着大门抽大烟，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。

方靖始终在门外窥视，他认为许崇智临危不惧，不失大将风度；不作无谓抵抗，也算识时务。既然如此，火拼流血事件不会发生了，他才暗暗松了一口气。

随后，蒋介石又派宪兵逮捕了许崇智的亲信梁鸿楷、张国楨、杨绵隆、梁士锋等八人。

九月二十日，蒋介石派参谋给许崇智送去亲笔信，大意说许优柔寡断，不能治军，妨碍部队整编，要求许去上海“休养”

一段时间。许崇智已被软禁多日，早有精神准备，毫不犹豫地随蒋介石派去监护的陈铭枢乘船离穗去沪。

被逮捕的许崇智八名亲信，蒋介石区别对待：命其中五人“筹款赎罪”；张国桢因曾与蒋介石在粤军中争当军长结怨，便跟梁士锋、杨绵隆一并处决。

事后，人们议论，认为许崇智追随孙大元帅多年，南征北战不无苦劳，蒋介石以刀兵逼其下野，未免太过；又要被逮捕的人“筹款赎罪”，则和土匪绑票差不多。

参加革命 军进黄埔

许崇智下了台，他的部下第七、八旅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师，在这年九月，参加第二次东征，协同第一、二师攻克惠州。

惠州号称天险，易守难攻，革命军屡攻不克，伤亡甚重，不得已悬赏组织敢死队。方靖抢先报名，并自任敢死队队长，经过三次奋勇登城，终于成功。当方靖在城楼上挥舞军旗、号召城下部队发起冲锋时，被暗藏的敌人冷枪射伤。

这一次方靖登城立了大功，不但没有升赏，反而免去了副营长的兼职。其原因是这时黄埔军校毕业生开始分发到各部队任职，与旧军官搞到一起，大有人满之患。方靖伤愈归队，几乎没有他的位置了。还是团长徐庭瑶念他作战勇敢，才把机枪营第二连连长的职务替他保留下来。

方靖归队不久，有一天，第三师副师长顾祝同带来几卡车黄埔毕业生，又将第三师下级军官集合在操场上点名。凡是点到名字的，就带着行李上卡车，拉去黄埔军校潮州分校第一期受训，他们的缺由带来的黄埔学生补充。

其实这是改造旧军官的好事，但是由于事先没有说明，使那些被拉去受训的军官产生疑惧。他们一上车就破口大骂，说什么他们为革命拼死拼活打了几年仗，今天竟被抛弃了等等。一直骂到潮州分校。

方靖对这件事倒有自己不同的看法。他认为：要想当大官，必须具备相当水平的军事知识和丰富的作战经验。但是他并没有被点上名，事后团长徐庭瑶对他说：“我念你打仗勇敢，所以特别关照，把你留下来。那些黄埔娃娃能带兵打仗吗？没有你这样的军官为中坚，部队非垮不可。”他哪里知道方靖并不领情！

方靖看到未来趋向，军队中必然形成一股黄埔势力，于是决心报考黄埔军校。徐庭瑶仍旧不舍：“去学那些干什么？你已经有少校军衔了，又有带兵作战经验，只要努力干，我会提拔你的。”方靖叹息说：“不进黄埔，将来军队之中，必无我立足之地。继续干下去，就是干到死也不会出人头地。少校军衔不要了，——如果考不上黄埔军校，我宁可回家当老百姓。”徐庭瑶见方靖很坚决，只好同意他去报考。

方靖报考黄埔军校，被录取在潮州分校第二期。入学时，分校得知他的经历，保留其少校军衔，并编在学员队受训。

当时军校分学生队和学员队两种。学生队是通过考试录取的社会青年，学员队则是各部队保送来的下级军官。学生队要先经过入伍（士兵）训练，然后接受军官教育；学员队则免除入伍训练，直接接受军官教育。论其素质，自然学生队比较纯洁，文化程度也比较高；而学员队则比较复杂，文化程度比较

低，有的人甚至不识字。

从这时起，方靖离开了粤军，转入黄埔系统。

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先生于一九二四年亲手创建的。原订受训期为三年，由于当时军情紧迫，急需军事干部，最长的受训期也没有超过一年，所以军事教育日夜进行，其紧张可想而知。学生们在校期间都武装待命，随时准备开赴前线投入战斗。一九二四年六月，军校学生执行孙中山先生的命令，平定广州商团的武装叛乱，首先树立了军威。尔后又增设了军官教导团，由何应钦担任团长。

潮州分校是在一九二五年三月第一次东征抵达潮汕后，为随同出发的黄埔第二期学员补课而设立的。这年十一月十二日开始招收学员大队和学生大队。十八日举行开学典礼，学员大队、学生大队各编为三个队，共计七百余人。十二月十日，蒋介石任命第一军军长何应钦为潮州分校代校长。

一九二六年一月，第一期学员毕业，五月开办第二期。当时，分校教育长由何应钦兼，政治部主任何玉书，政治教官王昆仑等，战术教官万超凡等。学员队大队长阮开基、大队副宋思一；第一队队长胡启儒，后改毛丰；第二队队长赵一肩，后为余绵元；第三队队长廖运泽。

在黄埔军校中，国、共两党的斗争很激烈，方靖进入潮州分校时，已是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以后，开始公开压制共产党了。第二期学员刚进校门，学员队第一队队长胡启儒就对大家说：“本校奉行三民主义，以蒋校长的意志为意志；共产党是帮助孙总理实行三民主义，完成国民革命的，至于共产主义，

它不适合中国的国情，同学们都要首先认清方向。”政治部主任何玉书在讲台上公然说：“孙总理说中国只有大贫、小贫，没有大地主、大资本家，没有阶级之分，不要搞阶级斗争。马克思是病理家，不是生理家。要把苏维埃那一套搬到中国来，实现共产主义，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。只有实行三民主义，才能救中国。”

黄埔军校的学员中，有不少共产党员，一些后来成为蒋军中著名将领的，如杜聿明、宋希濂、郑洞国等，还有军统特务头子文强，在校期间也曾经参加过共产党。

当时在黄埔军校中，国、共两党公开活动的组织各有一个，国民党的组织叫“三民主义学会”，共产党的组织叫“青年军人学会”。方靖曾填表申请加入共产党，填表后他请假回上海结婚去了，待从上海回部队时，党代表已撤走。这当然并非时机问题，主要是他当时对共产党的认识不足，没有早下决心。

一九二六年十月初，北伐军攻克武昌，驻军十四师师长冯轶裴召集潮州军民在潮州分校操场开庆祝大会。到会的除军人及分校的部分学生外，群众只来了几百人，而且多是小学生和老头。冯轶裴很尴尬，恼羞成怒，在大会上说：“今天到会的人数虽然少，也没关系，我们是重质不重量的。北伐军胜利是事实，庆祝是胜利，不庆祝也是胜利！”

过了几天，潮州地区工会发起庆祝北伐军大捷大会，也借用分校操场，由于工会在会前做了大量宣传工作，所以到会的有工人、农民两万多人，声势极为浩大。大会刚开始，潮州分校学员大队第一队队长胡启儒突然跳上讲台，指着到会的群众

质问：“你们今天来是干什么的？你们受骗了！他们骗你们来是造声势，摆威风！其实庆祝大会前几天已开过了，你们为什么不来？今天这个会是不合法的，是少数人制造分裂的阴谋。我看大家散了吧！散了吧！”台下右派学生跟着起哄，终于将大会搅散了。此事报到校本部，政治部来电谴责，说要惩办胡启儒，但是在蒋介石的包庇下，只不过把他调开了事。

尽管方靖在粤军中由小兵当到了少校营长，带兵打仗有实践经验，但是毕竟没有经过正规训练，战略战术都不懂。幸好黄埔军校，学了从班排到营团的战术教育，这对他尔后在国民党军队中指挥大部队作战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
方靖进入潮州分校的校门，就感到这里生气勃勃。无论训练多么紧张，没有一个叫苦叫累的，同学们交谈起来，都很有抱负。受训期间参加作战，真能以一当百，有进无退。他在粤军中染上的不良习惯，如抽烟、喝酒、赌钱，在进入黄埔军校后，都戒掉了。

一九二六年十二月，黄埔军校潮州分校第二期学员毕业共三百八十名，与本校第四期的毕业生同等待遇。

方靖毕业后，分派到东路军兵站总监部任监护队少校队长。十二月底，随东路军经福建漳州抵达福州。黄埔军校派共产党员江东琴任东路军政治部主任。在江东琴到差时，营门外列有仪仗队，东路军总司令何应钦亲自出来迎接。不料潮州分校政治部主任何玉书，早已暗中指使潮州分校分配来的二十余名学员站在仪仗队队尾，等何应钦偕同江东琴走进营门，这二十余名学员齐声喊叫：“打倒江东琴！”江东琴却不动声色，仍与何应

钦谈笑自如地走了进去。方靖也是其中的一员，却不明究竟。事后有人告诉他：这是政治斗争的需要。

当了辎重营长

一九二七年初，方靖调国民革命军第一军（军长何应钦）第三师（师长顾祝同）第九团（团长肖炳煌）任少校辎重营营长。辎重营长的主要任务是管理全团的经济，即后来国民党军队编制中的团军需主任。

部队由福建出发，经浙江江山、衢州、龙游、兰溪、桐城、富阳至杭州。出发时领经费大洋三万元。本应发给各连保管，因为当时正在打仗，方靖唯恐战乱中发生意外，连长或阵亡，或逃跑，银元追不回来，士兵朝他要饷钱，就负不起责任了。他便组织辎重营的部分士兵，每人挑一千元大洋。每块大洋按七钱二厘计算，一千元合约五十斤左右，加上士兵本身行装，担子是不轻的。方靖本人也十分辛苦，除了要指挥团直属部队四个连外，还要亲自照管这三十人的担子队。每到夜间宿营，他总是以担子为铺，躺在这些大洋上边，寸步不敢远离，真活象个守财奴。

三月下旬，部队到达南京郊外，听到隆隆的炮声。原来是第二军和第六军占领南京后，帝国主义企图阻止革命的发展，便借口保护侨民，从军舰上炮击南京，打死打伤南京军民两千多人，轰毁房屋财产无数。此时国民革命军士气很旺，听说洋人又在中国领土上横行霸道，都纷纷请战。由于蒋介石要讨好帝国主义，不支持军民反击，只通过外交交涉，马虎解决。

北伐初期，有共产党员在军队里做政治思想工作，对民众进行广泛宣传，而且共产党组织发动工农群众积极支援和配合，

所以战事很顺利，势如破竹。北伐军所到之处，老百姓设香案，放鞭炮，敲锣打鼓欢迎。不用去找，老百姓自愿当向导，不用去问，老百姓自动送来情报；也不用去拉伕，老百姓自愿给北伐军送粮草、弹药，而且一站接一站，没有间断。

两次反共活动

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八日，蒋介石在南京城内三牌楼以北，召集第一军及四十军贺耀组部训话：“现在武汉国民政府不给我们武器弹药，不发给我们粮饷。从现在起，来南京的国民政府人员就在南京开始办公。不受武汉的国民政府的约束。”接着，吴稚晖讲话说：“共产党要把俄国的苏维埃制度搬到中国来试验，实行共产主义，这是不会成功的。我们不能跟共产党合作，我们要实行三民主义。”

四月初，在南京金陵大学举行了一次“黄埔同学恳亲会”，参加的都是黄埔军校及其分校毕业的军官。蒋介石讲话时说：“国共两党合作，是共产党帮助国民党实行孙总理的三民主义，完成国民革命，而不是要实行共产主义。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，中国只有大贫、小贫，没有大地主、大资本家，所以不需要搞什么阶级斗争。只有实行孙总理的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。如果共产党把俄国革命的那套残酷斗争搬到中国来，我们就会死无葬身之地！我们从现在起，就要坚决反共，决不妥协。”

“今天来的都是总理的信徒，都是我的学生。我们要为实行三民主义、反对共产主义作出贡献。倘若我失败了，你们就要继承我未完成的革命事业。希望你们奋斗到底！”

在场的黄埔学生纷纷表决心：“我们愿在校长领导下，抱定有共无我、有我无共的决心，把实行三民主义、反对共产主义

的事业进行到底！”

蒋介石听了唏嘘半晌，说：“只要你们能够坚持这样的决心，我死了也瞑目。”

方靖是个比较内向而又不擅于辞令的人，所以在公开场合很少发言表态；但是在此时，也十分激动，把当初曾经拥护过共产党而且还要加入共产党的事忘得一干二净，也跟着别人疯狂地喊反共口号。在粤军中混了几年，他的阶级意识已经模糊，黄埔军校所受的教育，使他的信念彻底改变了。随着他在反动军队里的晋升，反共反人民的立场也愈坚决。从此他的信念是：“跟着蒋校长走。”后来，又加了一条：“跟着陈诚走。”时间愈久，这种信念也愈顽固，甚至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。至于共产党究竟如何？他丝毫也不了解，也不愿去了解。对于国民党的反共宣传，有许多他明知是假，却强迫自己去信以为真。因此，尔后他参加江西第三、四、五次“围剿”时，打得十分坚决，甚至失败了也不肯认输！当然，象方靖这样的人，在黄埔学生中决非少数。这些人就是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基础。显然，这两次活动，是煽动反共歇斯底里，为“四·一二”叛变革命、进行血腥大屠杀做军内动员。

国民党
军污成风

部队驻南京时，团长肖炳煌命令方靖从公款中拿出六千元给他的太太送去。方靖虽然认为这样做不对头，但又不敢违背团长的命令，只好照数送去。不料四月中旬，部队奉命由芜湖江陵镇之间渡江北伐，肖炳煌作战阵亡。方靖首先想到的是那六千元的事，他当时奉命送去，并没有向团长太太要收条，如今团长

阵亡，这笔钱的去向怎样交代呢？因此急忙返回南京，找到团长太太，要求补一张收条，以作证据。这位团长太太倒很好说话，当即照办，事情到此算是结束了。不料节外生枝，团长的老太太跑来要抚恤金。方靖告诉她：太太已领去六千元，实发的抚恤金用来还这笔钱还不够哩。但是太太不肯向老太太承认，老太太便要方靖同去当面对证。对证时，方靖将收条拿出来，太太见了便抢过去，撕得粉碎，拒不承认收过六千元。方靖急得满头大汗，眼睁睁瞧着撕得满地碎纸，无可奈何。幸好当时旁观者帮他把碎纸片拾起，拼凑粘贴，还能辨认。方靖便拿这张破字条去见师长顾祝同，请示该如何处理。顾祝同曾与他在粤军中共事，又同是江苏老乡，颇有交情，就替他出了个主意，报销了事。如何报销呢？从团部添置日用品、招待费等处报销。方靖这才恍然大悟：萧炳煌根本就不想用他的军饷归还这笔巨款，而是要他报销了事。显然，这种贪污手法在军队里早已屡见不鲜，甚至可以说是形成了一种习惯。只不过他一直当下级军官，又不理经济，不经其事，不知其窍而已。这样看来，当军需官的在替主官捞钱之余，自己的腰包也是满满的了。由此方靖懂得了一个很重要的生财手段：当上主官后，所用的军需官必须是自己的亲信，亲信军需官就会替主官想方设法贪污，不用主官过问，按月按时把“合法”的贪污钱财给主官送去或存入银行。这在国民党军中已是公开的秘密。

方靖刚刚把前任团长的六千元报销，新上任的团长又预支了两千元。不到一个月，新团长又阵亡了，这一回他不再去请示了，驾轻车，走熟路，报销了事。

虽然事情是应付过去了，方靖的烦恼也到了顶点。他明白新上任的主官第一件事便是捞钱，如此下去，他怎能受得了？所以便去找顾祝同，要求带兵打仗，发誓这一辈子也不当军需官。

由于有这段经历，方靖明白了当军需官的弊端，所以后来他当到师长、军长时，对那些军需官发起脾气来总是威胁说：“你们干的事我都清楚。哼！当过三年军需官的人，拉出去枪毙不用问罪！”

蒋介石下野和复职

一九二七年六月，北伐军第一军前锋已到鲁南，方靖所在部队进攻至山东临沂附近，因宁汉分裂，在武汉的北伐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挥师东下，意欲经安徽进攻南京，蒋介石十分惊慌，急命第一军总退却。于是方靖随军撤至苏州屯驻。

这年八月十二日，国民党内部发生矛盾，原是桂系军阀的李宗仁、白崇禧拉拢何应钦逼迫蒋介石下野。

蒋介石在南京召集高级将领会议，咨询对他去留的意见。在座诸将领默默无言，唯有刘峙站起来说：“总司令不要走，我们跟他们打。”这是蒋介石尔后重用刘峙的原因。当时，蒋介石很希望何应钦表态，何却始终低头不语。蒋介石忍无可忍，拍案而起：“好，我走！我走之后，谁要是解散我的二十个补充团，谁就是我的敌人！”

蒋介石拂袖而去，经上海东渡日本。

蒋介石下野后，何应钦、李宗仁、李济深组成特别委员会，又组成四个集团军：第一集团军何应钦，第二集团军冯玉祥，

第三集团军阎锡山，第四集团军李宗仁。

蒋介石虽然在日本，但是对于南京的情况了如指掌，因为那时有个军校第六期毕业的戴笠在上海向他密通情报。当何应钦与李宗仁为划分势力范围而矛盾尖锐化时，蒋介石便回到上海与宋美龄结婚。自此以后，蒋介石在经济上和外交上都得到宋家的支持，实力更加雄厚了。何应钦斗不过各派军阀，于一九二八年二月间请蒋介石回南京复任总司令。

一九二五年九月第二次东征前，在广州的国民政府组成的国民革命军共有六个军，蒋介石自兼第一军军长，至北伐才由何应钦接任，第二军军长是湘军的谭延闿，第三军军长是滇军的朱培德，第四军军长是粤军的李济深，第五军军长是粤军的李福林，第六军军长是湘军的程潜。后来经汪精卫游说，桂军李宗仁参加了国民革命军，编为第七军；北伐打到湖南，湘军唐生智部参加了，编为第八军。这八个军只有第一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，而何应钦到了关键时刻却演出“逼宫”之剧，企图取而代之。

蒋介石复职后，深深感到没有嫡系部队，只能受制于人，便积极着手整编军队，抓军权。第一集团军以黄埔教导团及第一军为主，加入一些改编过来的杂牌部队，编成六个师。此时黄埔学生羽翼未丰，只能以黄埔军校教官为将：第一师师长刘峙，第二师师长顾祝同，第三师师长钱大钧，第九师师长蒋鼎文，第十师师长方鼎英，第十一师师曹万顺。方靖所在的第三师第九团，在整编时拨归十一师建制，改为三十一旅六十二团，方靖改任第一营少校营长。